

C位、P图……中英夹杂词为何多了

本报记者 陈静文

“去K歌”“站C位”“P照片”……这类中英夹杂的表达，在社交语境中早已稀松平常。职场上，“见CEO”“做PPT”是工作常用语。医疗场景里，“照CT”“做B超”“进ICU”等简称也时常入耳。字母词的大量涌入，是否正在挤压汉语的表意空间？中文在吸收外来概念时，如何翻译才能实现信达雅？带着上述观察，本报记者与山西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方菁展开了对话。

鸠占鹊巢之忧

记者：英文字母词在日常交流和各类文本中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，是否已成为一种有共识的语言现象？您如何看待？

方菁：是的，这确实是一种常态化的存在。早在20年前，根据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的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（2006）》统计，VS、NBA、GDP、IT、MP3、QQ、DVD、CEO等10个字母词便已进入中文媒体前5000个高频词语行列。

包括近年来涌现的AI（人工智能）、VR（虚拟现实）、AR（增强现实）等技术概念，也呈现出英文缩写与中文学名双轨并行、缺乏通俗中文名的局面。今年3月，人民微博发起“给AI取个好名字”活动，网民高涨的参与热情，恰恰反映出公众的关切程度。

我们面对的，不是零星几个高频英文缩写词“飞来”鸠占鹊巢的问题，而是成百上千个字母词涌现 in 汉字沃土上。这关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与传承。

记者：回顾汉语吸纳外来语的历史，从汉唐的“佛”“塔”“葡萄”，到近代的“坦克”“咖啡”“沙发”，这些词全部变成了纯汉字的形式，完成了彻底的汉化。为何如今字母词频现，大有常态化趋势？这是因为汉语的“消化力”变差了，还是语言传播环境发生了变化？

方菁：这并非汉语“消化力”减退，而是语言接触的生态发生了结构性变化。

首先，外来语的词形变了。古代传入的多是“coffee”“sofa”这类独立名词，翻译时可以从其发音或含义着手。而当下高频涌入的多是复合语义的缩写，像“AI”“GDP”“CPU”，仅是原词组首字母缩写的集合，单个字母不承载独立语义。面对这种纯符号组合，传统的音义拆解法失去了切入点，翻译难度自然变高了。

其次，效率驱动，让缩写使用成为习惯。不论口语交流、手写记录还是键盘输入，“CT”“APP”都比“计算机断层扫描”“应用程序”简洁得多。这使得字母缩写逐渐被默认为一种通用符号，汉字译名的生存空间因此受到挤压。

最后，传播节奏呈几何级加速，命名机制滞后于技术迭代。古代慢工出细

活，译经僧、洋务译员推敲一个译名经常耗时数年。“telephone”传入中国时，从音译“德律风”到生动形象的意译“电话”，中间隔了数十年。如今技术概念以月、周、日为周期扩散，而规范译名的审定流程往往需要更长周期。这种时间差导致外语缩写常在专业领域和公众认知中先行占位，等规范译名出台，大众早已习惯旧称。

因此，当务之急是缩短译名周期，争取在概念爆发初期即确定规范的汉字译名，掌握主动权。

音义兼译 求“真”求“美”

记者：除了“夹生”的中英混搭字母词，您观察到哪些影响沟通或理解的共性现象？

方菁：汉语吸纳外来语，主力是名词，大致可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。我就结合自身经历，谈谈这两方面的“不顺畅”。

一是文学作品中人名的译介美学问题。十二三岁时读《希腊神话》，故事很吸引人，可那些冗长的音译名字像一堵墙，让我很难记住人物身份和关系。现在回想，这恐怕是直接音译造成的遗憾。只有“宙斯”“雅典娜”这类选字讲究、简短优美的译名，让我连同他们的故事至今难忘。

二是专业领域术语汉化的标准化滞后问题。退休后学AI绘画，为保护版权，我接触到“hash value”这个技术概念。一查，发现这一个词竟有4种不同叫法——商用密码与网络安全国标体系将hash定名为“杂凑值”；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（简称“名词委”）的计算机学科规范中则为“散列值”；除了这两个官方译名外，从功能描述出发，业内偶尔也称“摘要值”；在互联网工程、开发文档与大众科普中，通行最广的仍是音译“哈希值”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对照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韩林涛提出的6条外来科技术语汉化标准——音节经济、语义透明、隐喻恰当、读音顺口、具备派生能力、文化寓意积极，“杂凑值”“散列值”“摘要值”在语义透明、隐喻恰当和文化寓意积极这3条上表现不佳。“杂凑”字面自带“杂乱拼凑”的消极色彩，缺乏正向的隐喻支撑；“散列”“摘要”则表意隐晦，既无法让人直观理解其技术内涵，也难以唤起积极明确的审美联想。

所以说，标准一致、译介一致，很重要。

记者：就具体汉化路径而言，您认为外来词汉化应该怎样选择不同翻译方法？

方菁：应该肯定和感谢的是，您把核心问题放到了桌面，这也是“萝卜白菜，各有所爱”的难题。我认为，应建立“音义兼译优先，意译次之，音译为辅”的机制。汉字源于象形，同时也是当今唯一广泛使用的意音文字，形音义三位一体。比如形声字“河”，三点水表示与水相关，“可”部提示读音。

因此，音义兼译可视为一种理想的外来语汉化方法，力求同时满足读音贴近和字义精确。就比如“Gene”译为“基因”，“Hacker”译为“黑客”，都较好地实现了音义合一、望文知义的效果。这种译法的特点是求“真”求“美”——“真”指向语义的准确传达，“美”指向音韵的和谐与字义的优雅。

如果做不到信达雅的音义兼译，可以采用中间策略——意译，这种译法适用于源语言发音与汉字表意系统差异较大的情况。这种策略放弃对读音的刻意模仿，只求准确传达概念的内涵，重在求“真”。例如，“skyscraper”被译为“摩天大楼”，与英文发音无关，只取scrape（刮擦）之意，以“摩天”（接触天空）极言楼之高耸；“penicillin”先有音译“盘尼西林”，后有意译的“青霉素”之称，“青”指青霉菌，“霉素”揭示其微生物源抗菌本质，与土霉素、链霉素等形成同类术语集群，归类清晰。

当音义兼译和意译都难以实现时，比如遇到中文里完全没有对应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词汇，只能采用下策——纯音译。只重音似，不重表意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求“便”。早期多由译者个人草创的“沙发”“咖啡”，便均属此类。现在回看，“sofa”若早期被意译为“软座”，则更符合汉语构词习惯，让人能够望文知义。

音义兼译求“真”求“美”，意译求“真”，音译求“便”，按照优先级形成了梯次关系。不过，考虑到古语、表意、语音、语境乃至方言习惯等因素，通过这3种译法得来的中文词语各有长短，仁智各见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这也正是汉语的灵活性与包容性魅力所在。

记者：您个人有没有试着用音义兼译法翻译过一些外来语？

方菁：有的。英文“Show hand”，

意思是一次性全押筹码。香港电影《赌神》一出，音译词“梭哈”成了热词。能不能在贴近原音的同时加点意译的味道？我试译为“索瓜”。字面有“索求、瓜分、期待收获”的画面感，带点调侃，符合语境，也朗朗上口。

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趣味探讨，语言的约定俗成力量很大，最终还需专业审定。推敲的过程很有意思，就像给一个新事物找到它在汉语里的家。

共铸“百炼成词”的汉语熔炉

记者：在推进外来语规范工作方面，目前有哪些制度保障？我们又该如何进一步提升规范译名的接受度？

方菁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奠定法治基础，“外语中文译写规范协调机制”统筹各领域译写工作，名词委负责专业术语官方定名，三者共同构成制度保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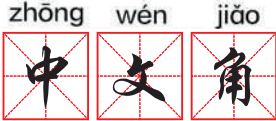
与此同时，适时引入公众参与，能让语言规范成为全民共建的文化实践。人民网发起“AI征名”活动，名词委公开试用新词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尝试。

记者：令人欣慰的是，中文始终保持着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。从“点赞”“刷屏”等网络热词，到“国潮”“村超”等立足本土实践凝练出的新语汇；从“新质生产力”引领发展，到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进入全球治理话语，中文的创新活力以及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主动建构能力清晰可感。面对这样的现实，我们对未来应抱持怎样的态度？

方菁：您的观察很重要，保护中文的自我更新能力，是语言工作者和全体使用者的共同责任。语言承载着一个民族世代沉淀的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与历史记忆，是文化存续发展的重要根基。

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翻译界便开始反思语言西化带来的隐忧。余光中先生批判盲目照搬外文句式、破坏汉语自身表达生态的现象，同时也提出，适度、巧妙的西化能够丰富汉语表达。

尽早推进字母词规范转化，完善外来语翻译规范机制，事关汉语表达力、社会沟通便捷性乃至文化自信。我们期待，若干年后，子孙辈面对新事物时，脱口而出的是形音义俱全、朗朗上口的汉语新词。那将是我们这一代人完成的文化创造。所以，行动起来，为了中文的明天。



每年7月，正是高考生们绞尽脑汁填报志愿的时候。所谓“志愿”，就好比射箭，“志”是靶心，“愿”是射箭的动作。一个人既要“有的放矢”，有志向、有目标，同时也要有意愿、有能力，才能射中目标。

今人只当这是比喻，古人却有据可考——“志”在古文中，还真有“靶心”的含义。

“志”以“心”为底，本义是内心志向，《尚书·尧典》中说“诗言志”，意思是诗歌能够抒发所思所想。

古人又将它假借，用来代指箭靶。《尚书·盘庚》记载，商王盘庚对臣子说：“予告汝于难，若射之有志。”这句话历来有两种理解：一说“志”即箭靶靶心，全句意思是应对危难当如射箭瞄准，心中须有坚定的目标（并为之努力）；另一说则认为此处的“志”特指练习射箭所用的骨矢（骨头做的箭）。依此解读，盘庚是劝诫众人要想克服困难，就要像射箭一样，平时多练习，才有准头。

射箭最初是古人狩猎、自保的生存技艺，西周时已纳入贵族子弟必修的“六艺”体系——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

春秋时期，孔子进一步升华了“志”的文化意蕴，认为射箭属于“君子之争”，具有君子之风。“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！揖让而升，下而饮，其争也君子。”（《论语·八价》）意思是君子没什么可争的事情，如果有，一定是射箭吧！（射箭时）先相互行礼，然后登堂比赛，（射箭完毕）下堂共同饮酒。这种比拼彬彬有礼、寓竞争于礼制之中，本质依然是以和为贵，这就是君子之风。反之，如果互不相让、不择手段、弱肉强食、零和博弈，那就成了今人所说的丛林法则。

这还不算完。《中庸》引孔子语：“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诸正鹄，反求诸其身。”正鹄就是靶心。他说射箭和君子的风格很像，没射中靶心，射手会反思自己的问题。这正应了孔子的另一句名言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”。君子对自己提要求，遇事从自身找原因；小人则相反，苛求别人，推卸责任。箭射偏了，小人会说：一定是箭靶子没摆正位置！它为什么不主动迎合我呢？

除了领悟“志”作“靶”解的修身智慧，我们更应深刻体会“志”字的原始含义——志向。立志，乃君子之风所由始，是成才的重要起点。

孔子是“立志”的模范。他“十有五而志于学”，15岁就立志做学问了。所谓学问，既包含人生大道，也包含类似于今天学生填报志愿时考虑的谋生之道。古代也分“小学”“大学”，“小学”主要学习识字、音韵、生活礼仪等基础内容；“大学”就要立志于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了。孔子15岁立志，显然是后者。

光有志向不行，还要有意愿、有行动力。因此，古人将坚韧的品格也纳入君子之风。《晋书·谢安传》载其“东山之志始末不渝”，说的是谢安虽负朝廷重任，却始终未改归隐之志。后世据此典故引申出成语“矢志不渝”。

“矢”本义为“箭”，大抵是由于箭出必不回头，因而在古文中常通“誓”，引申为坚定、决绝。箭无回头，誓不更改，正是君子持志的写照。

瞧瞧，古人多睿智。射箭，本是一项生存技能、一项运动，竟被寄寓了立志、自省、坚韧这样的君子之风。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，哲学大概也来源于生活吧？

（作者系尼山世界儒学中心〔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〕高级编辑）

『志愿』如同射箭

高金国

赴埃及孔院 搭民心桥梁



位于埃及伊斯梅利亚的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2008年成立孔子学院，2014年起与北京语言大学合作运营。10余年来，一批批中国青年教师远赴当地，以语言、文化为纽带，搭建中埃民心相通的桥梁。

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孙一凡、苏荣强先后赴该院开展中文教学工作，日常承担汉语授课、汉语水平考试备考与中文赛事指导工作，同时融入多样中国文化课堂活动。两位青年教师表示，中文教学是两国文明互鉴的双向旅程，他们愿以自身所学当好文化使者，助力埃及青年读懂真实、立体、全面的中国。

图为近日，在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，苏荣强（右一）带领学生参观郭沫若展厅。

新华社记者 张浩波摄

跨越山海 发现中国

——记2026北京外国语大学“发现中国”国际领导力提升营

王琦琳

2026年仲夏，北京外国语大学“发现中国”国际领导力提升营迎来14名外国学员。他们来自英国、厄瓜多尔、马来西亚、瑞士等多个国家，成长于不同文化环境——其中有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华裔后代，也有对中国充满好奇的国际留学生。

为期10天的提升营活动期间，他们先后到访北京、上海和浙江杭州。在模拟联合国的辩论台上锻炼思辨与口才，在人工智能与无人机企业触摸科技前沿，在故宫的长阶、上海的街巷与西湖的波光间各自找到“发现中国”的独特答案。领导力的种子，也在这跨越文化与国界的对话中悄然发芽。

表达的勇气

对于大多数营员而言，模拟联合国是个完全陌生的实践场。营员们在接受系统培训后，围绕移民议题展开了一场模拟外交谈判。来自牛津大学的马来西亚华裔学生冯成骏，作为志愿者导师全程参与教学。“很多学生刚开始很拘谨，有的甚至不太在乎，因为他们没想到自己会参加模联。”冯成骏回忆道，“但到



模拟联合国讨论环节，一名法国学生举手发言。本文配图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提供



在杭州的一家无人机科技企业，外国营员试飞自己亲手制作的无人机。

各寻“中国答案”

所谓“发现中国”，更深层次的“发现”关乎历史、城市与人。营员登上长城、走进故宫，触摸着砖石与宫墙，感受中华文明的厚重。

“在故宫，导游讲解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细节，比如有些宫殿的形状被设计成特定文字的样子，都是有原因的。”陈美琳说。陈晓琳补充道：“我们生活在厄瓜多尔，不太熟悉中国的历史，但父母很希望我们能多了解中国。我将来可能会考虑来中国读大学。”

“导游讲了很多我在马来西亚学不到的东西。这让我更珍惜自己的文化背景，也更喜爱中国文化了。”冯成骏说，“中国人在城市建设上十分尊重传统，注重保护古建筑。与此同时，使用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去传承和弘扬文化。”

奥尔登在不经意间捕捉到另一种“中国温度”——人与人之间自然亲切的互动。“在英国，人们比较少和陌生人社交。但在这里，我和几名中国大叔一起踢了场球，特别开心。”他说，“来之前我担心中国人可能不太热情，但实际上，每一次接触都让我觉得他们非常友善、乐于助人。”

短短10天，3座城市，无数个“第一次”——第一次公开演讲、第一次制作和试飞无人机、第一次详细了解故宫的飞檐斗拱。冯成骏用3个短语总结此行：“富有启发性、令人兴奋、一定要来。”

营员带回各自国家的，不仅是见闻与友谊，更有一份在跨文化对话中生长出的领导力——敢于发声、敢于担当、敢于在不同文明之间搭建桥梁。这或许正是这次夏日中国行赋予他们的珍贵礼物。